

ZHIXUE JIAZHILUN GANGYAO

哲学价值论纲要

马志政 等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13-05
3



哲学价值论纲要

马志政 郑国平 俞惠敏 著
刘井山 郑仓元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Y0300559

杭州大学出版社

哲学价值论纲要

马志政等著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

浙江诸暨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1.5印张 245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

书号：ISBN7-81035-094-3/B·003

定价：4.80元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哲学价值论著作，是浙江省哲学和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成果之一。

1985年秋天，为了给我首次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准备讲授哲学原理的专题课，我开始研究价值问题。次年1月，我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价值属性》一文，此文在哲学界的反映还不错，于是我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兴趣便很快增强了。同年5月，《哲学研究》编辑部与我所在的杭州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召开了“认识与价值”问题的讨论会，我是会议的主持者之一。这次会议讨论异常热烈，我得到很多启发。会间我萌发了一个念头：何不继续研究下去，搞出一本价值论的专著？又过去了一年，到1987年，浙江省社联安排“七五”期间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我便申报了这一课题。课题批准了，经费得到了，但由于教学和行政工作繁忙，加上课题组成员工作上的变动，所以前两年进展很慢。后来读到中国人民大学李德顺同志的专著《价值论》，在钦佩他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受到鞭策：必须抓紧搞出来，“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么。挤一挤、抓一抓，时间就挤出来了，课题也终于完成了，我松了一口气。

这本著作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是正文，即《哲学价值论纲要》本身。它是在课题组成员两次讨论大纲的基础上分章撰写初稿，最后由我修改、定稿而成。初稿撰写者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五章，马志政撰写。

第二章，郑仑元（浙江省委党校讲师）撰写。

第三章，俞惠敏（杭州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撰写。

第四章，郑国平（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撰写。

第六章，刘井山（杭州大学哲学系讲师）撰写。

第二部分是附录。这里有三方面材料，其一是在我们撰写过程中所碰到的有关哲学价值论若干名词概念表述问题的资料；其二是课题组同志有关哲学价值论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一些已经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有一些是我们的中期研究成果。但有一篇是例外，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探本》一文，它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郁建兴所写，考虑到我们需要这方面内容，所以一并收录于此；其三是我们摘编整理的关于价值问题讨论情况的概述。附录的所有材料，都经我修改和审定。希望这些材料对于有兴趣于哲学价值论探讨的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力图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探讨价值问题，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作出我们的贡献。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研究不深，加上修改、定稿的匆忙，可能有不少错误或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马志政

于杭州大学哲学系

1991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	(1)
一 价值论研究在我国的勃兴	(2)
二 借鉴国外的哲学价值理论	(12)
三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	(28)
第二章 价值及其形态	(39)
一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39)
二 价值的构成	(50)
三 价值的形态	(56)
第三章 对价值的认识	(71)
一 本体认识和价值认识	(72)
二 价值认识的过程	(81)
三 价值认识与真理	(96)
第四章 对价值的评价	(107)
一 价值评价及其特点	(107)
二 价值评价的标准	(114)
三 价值评价的类型和条件	(129)
第五章 价值的实现和创造	(139)

一	实现和创造价值是实践的目的和根本宗旨	(139)
二	价值创造的类型	(154)
三	价值创造的过程及条件	(164)
第六章	价值观念	(175)
一	什么是价值观念	(175)
二	价值观念的作用	(184)
三	价值观念的变革	(192)
四	坚持、普及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206)
附 录		(231)
一	哲学价值论中若干名词概念的表述问题 (马志政)	(231)
二	论价值属性(马志政)	(243)
三	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问题论纲(马志政)	(255)
四	对社会效益问题的思考(马志政)	(273)
五	关于价值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郑国平)	(287)
六	关于价值真理概念科学性的几个问题 (刘井山)	(293)
七	生产力标准的价值论研究(刘井山)	(307)
八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探本(郁建兴)	(315)
九	关于哲学价值问题讨论情况的概述 (俞惠敏)	(345)
后 记		(362)

第一章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特定称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性质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内容来说，它应当是个丰富的、深刻的、开放的因而能启迪人们思考和智慧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所演变、充实，以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更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的范畴，它们将经受哲学思维和时间 的考验，最后或者被确认，或者被拒斥；也会形成一些新的理论，它们也将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哲学家们的选择，或者被接纳为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继续游离在哲学的外围供人们思考，或者明确地归入它所应当归入的学科，或者被否定而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价值的范畴和价值的理

论现在就这样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

一 价值论研究在我国的勃兴

在80年代中国的哲学论坛上,有好几个问题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话题,其中有系统、价值、文化等等,一度形成过系统热、价值热、文化热。就价值热而言,我们认为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且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价值”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但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价值,探讨哲学的价值理论这件事,在我国,即使对于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不能不是新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吸引了相当的注意力,一度形成了“热点”,这就不能不从社会的时代的背景和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求根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在盛开色彩斑斓的改革开放之花。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总结了我国近几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形成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的制定深入人心,它的贯彻落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

改革,显然是当代国际性的流潮,拒绝改革,就堵塞了

变化、发展的道路。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它们的性质不同，目标不同和最后的结果不同。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的改革。为此，首先，所有的企业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提高工作效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要解决一个效益问题，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工业企业要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农业部门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所有部门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的兼顾。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运用科学技术，改进管理，解决效益问题。所谓效益，实际上就是价值问题。另者，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满足老百姓的个人需要也好，群众的需要也好，满足社会主义祖国的社会需要也好，也包含着价值问题。再者，改革，包括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以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着眼点，寻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效体制，为此，就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妥善处理责、权、利的关系。这里，也包括着价值问题。最后，随着改革的进行，为了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引起观念的变革，有些旧观念将被抛弃，有些新观念将被确立。在观念变革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价值观念的变革。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哪些价值大，哪些价值小，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但取决于实际利害关系，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它在每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影响着每一个人

的活动和行为。所以改革所引起的观念变革，其核心也是一个价值理论的问题。总而言之，改革的实践呼唤着从哲学上加强对价值理论的研究。

改革需要开放，改革也包括着开放，是对外开放还是封闭，这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对外开放，在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资金、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流入我国的同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甚至某些社会思潮都会这样那样地流入我国，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对于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学术思想，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借鉴其合理的、积极的东西，为我所用。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中的价值理论，也逐步地传入了我国，西方流行的价值观逐渐地渗透到中华大地。一方面给了我们启迪，激起我们探讨价值和价值观的兴趣和热情，这主要是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以及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出了挑战。这就是说，开放的实践也促进了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勃兴。只有通过认真的研究，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学术界才能一方面同国际学术海洋息息相通，同时体现自己的特色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斗作用。所以，开放的实践为哲学价值理论的研究加重了必要性和开辟了可能性。

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方针，从根本上纠正了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主导地位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左”倾路线，为切实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我国学术界（包括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许多以往争论过，由于种种原因

尚未解决的老学术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价值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理论只有在争鸣、辩论中才能稳固地发展，因为“真理愈辩愈明”。没有活跃的学术空气，没有严肃而又自由的学术讨论，理论的生气就将日渐衰竭。在左倾路线占主导的年代，更不用说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我国有价值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很少，其原因正在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为自由的研究和讨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价值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就得益于这样的学术环境。

我国哲学价值理论的研究，按照有些学者的估计，认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①。我们基本上同意这样的估计，其特点是：提出了哲学的价值问题，引起了哲学界的相当兴趣，就有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10年来，国内全国和省一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哲学价值理论（不含论述人的价值或人生价值的论文）的文章约150篇。我国对哲学价值论感兴趣，发表有关论文的，大约有95%以上都是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因而前景和潜力是很大的，这有利于它的持久和深入。

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提出问题阶段（1980—1984年）。

哲学价值问题的提出同实践标准的讨论是有关联的。从间接的、深远的影响这一层面来看，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

^① 王玉樑主编：《价值和价值观》第5页。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极大地解放了哲学界的思想，为探讨新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哲学界需要探讨一些新问题来释放潜存的能量，他们找到了价值理论，因为它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明确的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有突出的印象；而且价值问题既有明显的实践性，又有耐人寻味的思辨性，这非常适合哲学的口味，所以它的首先提出是理所当然的。从直接的、切近的影响这一层面看。实践标准的讨论主要是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权威，至于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因此讨论结束不久，便引发了“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是什么？”的讨论。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用意当然是想使实践标准的讨论在理论上深化一步，因为问题是明摆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意味着只有用实践及其结果才能检验一种认识（或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一般来说，成功的实践结果证明认识的真理性的，失败的结果证明人的认识的失误；既然如此，又应当用什么来检验或衡量实践的成败呢？这一问题的提出，初看起来似乎浅薄得很，推进不了对实践的研究。其实不然，讨论下来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实践目的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或者说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是衡量其成败的标准。更具体地说，他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最高的目的，可以用它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我们实践的成败得失。第二种意见明确反对第一种意见，并认为它用主观目的的框框去裁剪实践和历史，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们主张应以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为标准来判断实践的成败，并指出：“判断实践的成败究

竟是以符合客观规律为标准，还是以符合人的实践目的为标准，这是根本对立的 two 条认识路线。”^①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是衡量实践成败的客观尺度。三种意见中，除第二种外，都涉及到价值理论的问题，所以有关论文已经指出：人必须从两方面把握对象，一是把握物的固有属性，二是把握物满足人需要的属性即价值，才能正确地确定实践目的并进行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

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了价值理论的研究，而作为这一研究真正开始的标志是上海的《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了杜汝辑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首次明确提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之分，前者是关于事物“是如何”的认识，后者是关于事物“应如何”的认识，表现为关于事物是好或坏、善或恶、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评价。文章列举了大量例子论证了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把它们割裂开来或混同起来都是错误的，前一种错误会导致唯心主义先验论，后一种错误会导致实用主义。文章还提出，社会实践作为对社会事物认识是否真理的检验标准不论对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都是适用的。这篇文章虽然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区分限制在社会事物的领域，对它的普遍性估计不足，但它的历史功绩在于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价值问题（当然还限于认识论领域），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8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文，肯定杜文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并

① 《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第51页。

认为价值问题的提出为当时《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在讨论的“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在理论上的敏感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敏感性表现在，它热烈地肯定了研究价值问题的意义并正确地指出了价值问题的探讨同实践本身的评价标准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此以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国内哲学动态》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提出了问题，初步引起了哲学界的注意，为下个阶段的第一次讨论高潮准备了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6年，这是哲学价值论开展热烈讨论并取得较丰富成果的两年。

1985年5月，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的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上，在着重讨论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以及真理是不是多元的同时，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并作了初步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顺同志作了主要发言，他提交的文章《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同年第3期上。讨论虽然是初步的，但由于问题新鲜，加上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人很多，所以影响不小，对于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随后，在1985年的秋冬之季，《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文杂志》等相继刊发表多篇文章。《哲学研究》在发表袁贵仁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和薛克诚的《客观真理刍议——兼评价值真理》时，还加了编者按，

并决定开辟“关于真理与价值问题”的讨论专栏。我国最高级哲学刊物《哲学研究》的介入标志着哲学的价值问题受到了哲学界的高度而广泛的关注，《哲学研究》专栏的开辟又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展开，虽然这一专栏还限于从真理的角度或更广泛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价值问题。随后，《哲学研究》的这一专栏又连续发表文章，有的就价值真理问题作出分析，有的实际上已突破了上述狭小视角而从一般价值理论的方位考察哲学的价值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问题。本书作者之一也曾发表《论价值属性》一文^①，提出了本体属性价值化、正负价值的区分及价值计量等问题和相应论点，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

《哲学研究》专栏的开辟，有力地推动了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江汉论坛》、《人文杂志》等都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在这一基础上，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发起并组织，于1986年5月在杭州召开了“认识与价值”学术讨论会，使哲学价值理论的讨论第一次达到高潮。这次讨论会着重对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概括，对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价值范畴的内涵、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会对我国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②

第三阶段，1987年以后，哲学价值论处于进一步研究阶

① 马志政：《论价值属性》，《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见本书附录。

② 参见王玉樑主编：《价值与价值观》第6～7页。

段。

这一阶段的价值论研究，一方面是比较前一时期深入了，这种深入表现在：其一，是对价值论的研究现状作了反思，从而进行了关于“普遍价值定义”的讨论，郝晓光在《光明日报》（1987.1.5）和《江汉论坛》发表《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等文章，对近几年价值论研究中不少文章作为立论根据的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提出否定，指出这不是马克思的论点，而是受到马克思批评的瓦格纳的论点。由此引起了讨论，讨论涉及到以下的问题：对马克思的话如何理解？对价值的这一定义即使是瓦格纳的论点是否一定错了？普遍的价值定义到底有没有根据？能否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规定哲学价值范畴？等等。其二是价值观及其变革问题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价值观是哲学价值理论中十分重要并且最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首当其冲地面临着剧烈的变化。对价值观的关注、研究，对价值观的合理变革给予指导，是理所当然和十分迫切的。自1987年始，探讨价值观的论文有所增加，这年的11月份，在西安举行了“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讨论会。价值论研究有所深入的以上两个方面，在这次会议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次讨论会的成果收集在王玉樑同志主编的《价值和价值观》这本论文集中。另外，中日两国哲学家曾就若干哲学问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其中一个就是价值观念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德顺作了题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主题发言，指出“价值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外